

6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种族暴力冲突的特征及其根源

梁茂信 聂万举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自20世纪以来,美国城市的种族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但就其频繁性、规模和破坏性而言,惟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为突出。其主要特征是,所有暴力冲突都发生在中心城市,而且其重心也在向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西部和南部城市转移。虽然黑人和白人的矛盾仍居主导地位,但有色人种间的冲突颇为引人注目。其促成因素在于当代美国人口流动和城市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后聚居于中心城市的有色种族日益增长的贫困化、新形式的种族歧视、不公正的司法、日趋复杂的种族关系及新闻媒体的煽动性宣传等等,这些都是当代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突出表现。

关键词:种族冲突;中心城市;贫困人口;种族关系;新闻媒体

中图分类号:K12.54

文献标识码:A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tioning factors of violent racial conflicts in American cities since the 1960s

LIANG Maoxin, NIE Wanj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Racial conflicts in American citi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in terms of frequency and destruction, the racial violent conflicts since the 1960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Although all of the major conflicts took place in central cities, most of them happened in big cities in the West and the South. Whil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Blacks and the Whites still dominated the center of the scene, conflicts among Minorities, such as Blacks, Hispanics, Koreans and other Asian groups, have been rising rapidly. Related conditioning factors basically include the decline of the central cities which are mainly inhabited by residents of minority groups who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 growing poverty rat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segregation, ethnic tension, and police abuse. The failure of justice and misleading reports by mass media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racial conflicts.

Keywords: racial conflicts, central cities, the poor, race relations, mass media

种族暴力冲突作为社会问题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美国各大城市多次发生,但就其频繁性、规模和破坏性而言,没有哪个历史时期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猛烈地震撼着美国社会。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个别有影响的力量只是以传统史观对60年代的种族暴力冲突略加论述,认为它是这一时期美国群众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原

因“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美国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其中包括贫富严重分化、种族歧视肆虐、青年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1]。但是,对于60年代以来种族暴力冲突的社会根源,特别是与市场经济下美国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种族关系变化等问题的联系,尚无系统而深刻的分析。为此,笔者拟陈述管见。

收稿日期:2000-11-16

作者简介: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史学博士;聂万举,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博士。

一、种族暴力冲突的浪潮及特征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城市的种族暴力冲突主要限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大大小小的暴力冲突共有30多次,其中主要集中在两次高潮期。第一次是1915-1919年间,共达22起,规模较大的是1917年圣路易市的种族冲突,其间有312栋房屋被毁,48人被杀,100多人受伤。另一起是1919年芝加哥的冲突,造成38人死亡,537人受伤,财产损失200多万美元^[2]。同年,类似的暴力冲突在首都华盛顿、奥马哈和查尔斯顿等20多个城市爆发,达到第一次高潮期的顶峰。第二次高潮是1943年,主要冲突发生在纽约市和底特律。两次冲突共造成6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600多人被捕,财产损失达500多万美元^[3]。这两次浪潮恰好发生在南部农村黑人向全国特别是北部各大城市的大迁徙时期。面对纷至沓来的黑人,城市下层白人恐慌不安,担心黑人在住房、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威胁到白人的生活方式,遂以暴力方式屡屡排斥黑人。另一方面,自20世纪以来,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强烈。早在1916年黑人领袖W. E. B. 杜波依斯在抨击白人种族主义时就指出,暴力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摆脱白人压迫的最有效方式。“只要白人世界压迫、蹂躏和侮辱不停止,白人与黑种人、棕色人种和黄种人的冲突就不可避免”^[4]。这种主张点燃了黑人心中因长期深受种族压迫而蓄势待发的复仇火种。因此,每当受到白人暴力排斥时,黑人则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导致暴力冲突频频发生。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黑人民主参政意识的空前提高,黑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迅速展开,猛烈地震撼着美国社会的根基,迫使美国国会在60年代中期颁布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权法,从法律上废除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种族隔离制度。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黑人发起的暴力浪潮席卷了美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其数量之多,波及面之广,在美国历史上属前所未有的。在1961-1969年间,各地城市共发生大大小小的种族冲突达2500多起,伤亡人数达9500多人。大型冲突主要集中在1964-1968年。在这四年间除一些与学生反对越战、反主流文化和妇女运动相关的暴力冲突外,有239次大型种族暴力冲突,参与人数多达20多万,造成约200多人死亡,8000多人严重受伤。其中,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于1965年发生在洛杉矶瓦茨区。由于黑人马凯特·佛赖伊超速驾驶,随意改换车道,被白人警察在瓦茨区抓获。警察遭到围攻后,冲突骤然加剧,政府动用了1.6万军人和警察才将其平息。在冲突中有34人死亡,1032人受伤,4000多人被捕,600多栋房屋被毁,财产损失达4000多万美元^[5]。此后,克利夫兰、纽约、费城和芝加哥等城市的种族暴力冲突有增无减,此起彼伏,使美国社会处于史无前例的动

荡中。到1967年,各城市的种族暴力冲突达150多次,达到60年代的高潮。其中7月23日至30日发生在底特律的冲突规模最大,有43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3800多人被捕,5000多人无家可归^[6]。

20世纪70年代以后,暴力冲突明显减少。除1977年纽约发生一次无人员伤亡的小规模冲突外,有三次发生在洛杉矶的西班牙裔社区。时间是1970年1月1日、8月29日和9月16日。前两次因西班牙裔反对越战而起,后一次因警察施暴而发。三次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有数十家商店被毁,400多名西班牙裔被捕^[7]。在这十年间,迈阿密也是一个多事的城市,先后发生小规模冲突13次。80年代,迈阿密又发生三次暴力冲突,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80年冲突。由于黑人青年阿瑟·麦克杜菲驾车超速行驶,四名白人警察将其毒打致死却谎称死于车祸,为使案情得到“公正”审理,市检察院将案件移交只坦帕市审理。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半年后决定警察无罪释放,导致种族暴力冲突爆发。其间,18人死亡,400多人受伤,1100多人被捕,财产损失约2亿美元。1982年和1989年的两次暴力冲突相对较小,共造成1人死亡,48人受伤,430多人被捕^[8]。

1992年洛杉矶市中南区爆发了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1991年3月初,25岁的黑人无业青年罗德尼·金在回家的路上乐极生悲,超速驾驶,被警察发现后追赶并残酷施暴。全部过程恰好被附近一居民乔治·霍利德用摄影机拍摄下来。次日,录像带被有偿转让给洛杉矶电视台后,消息传遍全美乃至全世界。此后至1992年4月末,洛杉矶市警察局、市政会议和黑人市长汤姆·布拉得利围绕惩罚肇事警察和要求警察局长达利尔·盖茨辞职之事,舌枪唇战,矛盾迭起。市政府调查委员会有关警察局管理混乱、滥用职权、知法犯法的丑闻面世后,群情哗然,民情日增,黑人要求严惩肇事警察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洛杉矶检察院将案件移交文图拉县西米谷社区法庭审理后,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于4月29日下午决定四名警察无罪释放。从当天晚上起,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亚特兰大、拉斯韦加斯和华盛顿等30多个城市发生暴力冲突,这些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旧金山有100多家商店被抢劫,1500多人被捕。在亚特兰大有73人受伤,370人被捕,50多家商店被抢劫^[9]。但是,在这些城市中惟有洛杉矶的冲突最为惨烈。在为时7天的冲突中,共有58人死亡,2300人受伤,9400多人被捕。在死者中,有黑人27人,西班牙裔17人,白人11人,亚洲裔2人,另有1人身份不明。在被捕者中,51%为西班牙裔,36%为黑人,白人占11%,其他民族占2%^[10],其中60%有犯罪前科,有人甚至被捕入狱达32次,2/3以上低于中学学历且无职业,另外1/3是从事低薪职业的体力劳工。从年龄看,80%在34岁

以下,35岁以上仅占20%^[11]。从财产损失看,被毁的商业建筑价值达7.75亿美元,民宅和公寓价值达4.3亿美元。其中,服装、杂货店、餐馆、白酒零售和娱乐业较多。在民族构成方面,韩国裔首当其冲,占财产损失总数的33.9%,其他亚洲裔占10.3%,西班牙裔占10.7%,而“其他”类和“合资”类共占45.3%,其中也有不少韩国裔和其他亚洲裔的财产^[12]。

综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暴力冲突,其主要特征是:(1)每次冲突都发生在中心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在暴力冲突的高峰期西部和南部城市也会发生冲突。但就其数量、社会涉及面和破坏性而言,其重心却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在1970年以后,规模较大的冲突无一例外地发生在经济迅速崛起的西部和南部城市。(2)参与者不仅有隔都区(gh-etto)的黑人居民,而且还有隔都区以外的白人居民,其中以青年、低学历和非熟练劳工较多。根据“克纳委员会”在1967年对底特律等六个暴力冲突比较激烈的城市调查,在被捕者中间,83%是黑人,89.3%为男性,年龄在15-35岁之间的占80.3%,其中15-24岁的占52.5%,无业者占31%,其他为就业的贫困劳工。从犯罪记录看,在主要暴力冲突中的被捕者中有74%的人有犯罪前科^[13]。1980年冲突后的被捕者主要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其比重占总数的67%,30-39岁者占21%,40岁以上者占12%,65%为男性单身。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学历构成略高于60年代,其中高中以上学历为62%;二是犯罪前科者比例较低,其中24%有犯罪前科。在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被捕者中间有70.6%没有犯罪前科^[14]。这种学历低、有前科犯罪者的参与率较高的特征在1992年洛杉矶冲突中也非常明显。(3)在多数情况下,暴力冲突前都有黑人违法在先、执法警察施暴在后的事件。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年以前这种引爆性事件与冲突的实际爆发时间几乎没有间隔,而在1980年迈阿密和1992年洛杉矶冲突中,前者间隔半年,后者为一年,而且有关警察施暴的案件审理都是由异地白人陪审团审理,结果都是四名施暴警察无罪释放。(4)在1980年以前,每次冲突的双方仅限于黑人与白人或西班牙裔与白人,80年代迈阿密三次冲突中有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而在1992年冲突中,事件因黑人与白人矛盾缘起,但在冲突中除白人和黑人外,还有西班牙裔和韩国裔。死亡人数中黑人最多,而被捕者又以西班牙裔最多,财产损失的主要受害者又是韩国裔,表明四个种族的矛盾错综复杂。

二、中心城市居民的贫困化

每次冲突之所以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城市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如日中天的中心城市作为城市政治经济

的枢机,它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和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氛围不仅吸引了资本投资和商业活动,而且吸引了大批劳工从国内外蜂拥而至。劳动力和资本的集中增强了中心城市自身的造血功能并通过辐射作用带动了郊区的发展。但是,二战以来,由于中上层白人和企业郊区化进程加快,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对劳工技术要求较低的蓝领职业骤减,而高科技含量较高的服务业却蒸蒸日上。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自1949年起相继实施了改造贫民区的城市更新计划和就业培训政策,60年代中期又实施了“向贫困开战”计划,使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明显改善,中产阶级脱颖而出。1966年28%的黑人的家庭收入在7000美元以上,比1949年增加了4倍。“在高科技、高地位和高工资职业就业的黑人比例增长率高于白人的增长比例。”但不可忽略的是,中下等黑人家庭的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与白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47年黑人和白人中等家庭年收入之差为2174美元,1966年为3036美元^[15]。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社会期望值在民权运动中不断上升的黑人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加上其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暴力就成为黑人发泄对社会不满的首选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富有人口和企业的郊区化依然方兴未艾,中心城市的人口和经济结构继续朝着不利于贫困人口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适合于非熟练劳工的低薪就业机会大量减少,而技术含量较高的就业机会却迅速增加。例如,在1958-1989年间,纽约市制造业和商品的批发零售就业机会的比重下降了43%,费城下降了44%,亚特兰大为36%,达拉斯为37%,丹佛为35%,西雅图和底特律同为27%,芝加哥为25%,洛杉矶为23%。同期,这些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均增长100%以上。另一方面,在城市人口构成上,中心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继续增加,成为其中的“多数民族”。1990年,有色种族占迈阿密人口的85%,华盛顿的71%,底特律的70%,亚特兰大的65%,芝加哥的61%和巴尔的摩的60%^[16]。就业机会与人口结构的反向发展使中心城市人口的贫困化空前加剧。一方面,在制造业就业机会大量流向郊区的同时,其生产技术的现代化使生产效益成倍提高,对非熟练劳工的需求日益减少。即使有许多非熟练劳工能够在郊区谋到职业,但因蓝领职业的低薪性质使其在扣除日渐上涨的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后又无力解决交通支出,所以大批底层劳工望而却步;另一方面,由于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服务业在中心城市迅速发展并渐居主导地位,这与中心城市日益增长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非熟练劳工对低薪职业的需求背道而驰,因而中心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大量劳工常年失业或就业不足,失业率比郊区高一倍,同时,中心城市“比以前更加依赖于郊区的劳动力,需要他们应聘那些必须具有高等学历和技术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17]。在这种情况下,无业劳工只好被困在繁华都

市的贫民区。在1970-1990年间,纽约中心城市贫困人口增长率为39%,芝加哥为60%,费城和底特律分别为74%和58%,西雅图、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分别增长了141%、98%和75%,而达拉斯和迈阿密分别为52%和49%^[18]。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西部和南部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几乎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并驾齐驱,但贫困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后者。这表明西部和南部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在20世纪经过腾飞和发展后已经到“成熟期”,其发展潜力达到饱和状态后各种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同时,70年代后暴力冲突的重心向西部和南部城市转移恰好与战后美国区域经济重心的变化是一致的^[19]。也就是说,日新月异的西部和南部城市是当代美国种族暴力冲突最频繁最激烈的地区。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人口流向密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产业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劳动力供给之间仍存在有差距,就业的供求关系相互脱节,那些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工相对容易就业,而非熟练劳工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坐地户”或先入为主者因担心新来者威胁到自己的就业和生活水平而对其以暴力排斥。二是在人口流向密集的地区,经济发展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劳工蜂拥而至,而这些地区的住房、医疗、教育和交通以及相应的市政管理机制等往往滞后于因人口迅速增加而产生的社会服务需求,这必然使失业率、贫困、环境卫生、司法和民族矛盾等社会问题相对比较突出。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任何具有导火线性质的事件必然会引起暴力冲突。正是这个原因,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现了人口流向、经济发展和种族暴力冲突三者并行不悖的现象。

如果说郊区化加剧了中心城市居民的贫困化,那么,里根政府在80年代有利于富人的财政和经济政策犹如釜底抽薪,使贫富两极化加剧。1980-1991年间,国会两次颁布立法,以十分隐蔽的形式使中上层阶级每年的纳税额平均减少了30%,同时,联邦政府将公有住房、就业培训和各项福利的支出削减了75%以上,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这种抑贫扶富的政策使1000多万贫困家庭在经济收入减少的同时没有得到任何住房补助,而同期的房租却上涨了188%,两者的反差使黑人和拉美裔的住房支出占去其收入的57%,其中有110万黑人家庭达到70%。不仅如此,由于贫困人口的增加和联邦公有住房建设不足,住房租赁市场供求矛盾尖锐。1978年可供出租的低价住房比租房户多34万套,到1985年,排队的租房户比可供出租的住房多370万^[20]。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家庭必须高价租用私有住房或露宿街头。

洛杉矶作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城市,其中心城市人口贫困化最有代表性。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与亚太国家贸易迅速发展,联邦国防支出不断增加,加州经济欣欣

向荣。尽管经济由以制造业为主向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服务业发展迅速,非政府部门服务业就业机重的比重由1973年的49%增至1989年的58%,净增65%^[21]。在新增就业机会中,除纺织、家具服装和餐饮业等迅速发展外,多数与飞机、电子、交通设备、导弹和微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联系密切的服务业相关,而传统的耐用品工业如轮胎、钢铁和汽车等产业中的低薪就业机会明显减少。在地域分布上,就业机会的主要增长点不在中心城市,而在郊区,仅20世纪80年代从洛杉矶市区前往郊区的各类公司多达220家,其中有许多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榜上有名。它们迁至郊区后,一大批高科技中心、工厂和商品批发与零售中心在那里纷纷拔地而起,形成了一个“外缘城市”^[22]。与此同时,那些在业务上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的中小企业也因失去了服务对象而纷纷停业。更糟糕的是,在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国防预算骤减,休斯、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及诺斯洛普和洛克威尔等以国防工业为主体的大公司纷纷裁员,洛杉矶的失业率随之增长了一倍。1991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整个加州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从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看,该州遭受打击的程度在全国最为严重。”1991年6-9月,全国的失业率由7%下降到6.7%,而加州由8.2%下降到7.7%。当全国经济在1992年初开始缓慢恢复时,加州仍然在低谷徘徊^[23]。在爆发冲突的洛杉矶市中南区,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率令人触目惊心。在16岁以上的人口中,未进入就业市场和失业的比率达42%以上,其中黑人男性为52.7%,女性为57.9%,西班牙裔男性为29.9%,女性为59.9%,白人和亚洲裔明显偏低^[24]。如此高的失业率使人口贫困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贫困率为38%,其中,黑人为56%,西班牙裔为42%,白人为12%,亚洲裔为13%,比全国各类同比均高一倍以上。在年龄构成上,加州的青少年贫困率平均为12%,而洛杉矶中南区为44%^[25],如此差的经济环境为各种社会犯罪活动的泛滥提供了温床,而大量流落街头的贫困人口必然使民众怨声载道,群情沸腾,一俟动乱爆发,其规模可想而知。

三、种族歧视与司法不公正

在美国历史上,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抑或是一种社会制度,种族歧视已经成为无法根除的社会痼疾,不仅法律和整体的社会运行机制的首要宗旨是为中上层白人服务,而且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行为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尽管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促使国会颁布了民权法,禁止政府机构和个人以任何方式歧视和剥夺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但存在于教育、住房和就业市场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性种族歧视依然是阻挠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主要障碍。正如1967年《克纳报告》中所言:“种族歧视和隔离长期主

宰着美国的社会生活,现在又威胁着每一个美国人的将来。”“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分离而且不平等”^[26]。在这两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白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黑人的困境,政府没有尽力解决它对黑人在诺言和现实中的差距。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不仅北部城市的黑人从失望和压抑走向愤怒与反抗,而且对于从南部迁徙而来的黑人来说,他们追求平等和摆脱贫困的渴望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然而,民权法颁布后他们依然在种族隔离的桎梏下苦苦挣扎。这种受挫情绪和历史上的悲惨经历以及由此滋生的报复心理愈演愈烈,导致了暴力的发生。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种族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深深地隐藏于政府的战略与策略、政府职能与党派竞争的概念中、以及每个选民政党认同的潜在意识中。它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两党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但丝毫没有改变其种族因素的内在实质”^[27]。换句话说,种族主义以更为巧妙的方式操纵着两党的政治生活和各级政府的决策,其至高无上的圭臬就是维护种族隔离和贫富两极分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虽然政府部门、教会、教育和娱乐设施等公共场合的种族歧视有所减弱,但是,在住宅方面,种族隔离丝毫没有改变。白人中上层阶级迁往环境优美、服务设施齐全的郊区后,他们不反对利用中心城市的服务设施和高薪就业机会,但丝毫不允许中心城市的恶劣环境在郊区出现。所以,许多郊区政府竞相颁布条例或以居民表决的方式严格限制贫困人口的迁入。“不仅全国有许多郊区政府声明放弃接受联邦的任何城市开发基金,而且有许多致力于开放其郊区的官员被迫停职,有的官员的财产受到破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更可怕的是,有些白人种族主义者使用暴力手段驱赶前来落户的黑人。此类事件在纽约、芝加哥、费城、圣路易、克利夫兰和波士顿等城市经常发生^[28]。在这种情况下,郊区与中心城市形成了以种族和社会等级为核心的社会隔离。到1990年,在全国最大的20个城市中,种族隔离指数平均为73%,其中,底特律为87%,芝加哥为86%,费城和圣路易为78%,洛杉矶和堪萨斯为72%^[29]。这种格局与60年代毫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的社会隔离又多了一个层面。它不仅限于白人对黑人的隔离,因为被困在中心城市的还有贫困白人和其他有色种族。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已经不是一个黑人与白人相互隔离且不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由黑人、白人、棕色人和红种人等多种族组成的相互分离而且不平等的社会”^[30]。

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中,警察和法庭作为司法机关,其能否公正地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对每个民族群体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警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不仅在日常执法中成为维护白人利益的工具,而且在历次冲突中助

为虐,协助白人暴民排斥黑人。到60年代,这种现象依然如故。1967年《克纳报告》中指出:“自1964年夏季以来,在纽瓦克、底特律、瓦茨和哈莱姆等每一个发生种族冲突的城市,警察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摩擦一直是不满情绪、紧张关系和最终爆发动乱的主要根源”^[31]。在暴力冲突中,甚至维持秩序的“白人士兵和国民警卫队员在晚上向黑人商店开枪扫射,而且,这显然得到了他们上级军官的认同和鼓励”^[32]。这种恣意妄为的违法行为不仅加剧了暴力冲突中的混乱现象,而且丑化了执法机关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警察之所以对少数民族频频施暴,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失业人口多,社会问题突出,因而警察与当地居民的接触比较频繁。由于少数民族长期饱受贫困和种族歧视之苦,各种不满情绪比较强烈,对警察有成见,认为“警察是白人权力、种族主义和压迫的象征。在实践上,许多白人警察却表现出这种态度。警察的施暴行为和腐败现象以及执法中的双重标准使黑人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增强了这种敌视气氛和犬儒主义行为”^[33]。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警察的种族歧视有关,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司法权力的象征和维护社会治安的执法者,警察在心理上常有一种捉拿罪犯的思想准备。这种以合法的暴力打击非法暴力为主要特征的职业在潜移默化中使警察染上了易于施暴的“职业病”,加上美国的法律允许私人藏有枪支,所以,在少数民族社区,“警察持有的种族偏见比任何人都强烈。在他们眼中,每一个黑人和拉美裔男性都有暴力犯罪的嫌疑。”当被怀疑者有任何暴力反抗的举动,都会遭到毒打或被枪杀^[34]。也正因为如此,80年代迈阿密三次暴力冲突前均出现了西班牙裔警察对违章驾驶的黑人施暴的现象。1991年华盛顿市一位黑人警察开枪打死一位有持枪嫌疑的西班牙裔后,引起黑人与西班牙裔的冲突,导致10多名警察受伤,113名西班牙裔被捕,100多家商店被毁^[35]。这类事件既表明警察施暴不仅仅限于白人警察,而且有色种族的警察也会因其“职业病”而向其他有色种族的居民滥施暴力。

在洛杉矶,罗得尼·金被毒打决非偶然性事件。由于警察知法犯法司空见惯,不仅少数民族深受其害,而且虐待白人妇女的事件不绝于耳,因此,民众投诉洛杉矶警察的案件直线上升。1981-1985年间每年平均在1200起以上,1986年增加到1813人次,1991年1-10月猛增至2425人次^[36]。警察严重渎职,关键在于其局长达利·盖茨。盖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黑人无论怎样提携,都不可救药,甚至不应该在美国存在。他在1988年抱怨黑人社区的问题棘手时说:“我们洛杉矶有那么多生活悲惨的狗杂种,可是我们的社会却允许他们在大街上游荡”^[37]。在他的领导下,警察局内部贪赃枉法、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不仅许多人参与毒品走私,而且“还有许多人参与经营妓院、买卖枪支、贪污公款、持枪抢劫和凶杀

案件^[38]。在市区巡防方面,警察局违反常规,奖惩倒挂,纵容警察施暴。据洛杉矶市政府的调查,“洛杉矶警察局不是鼓励警官与其服务的社区相互沟通,而是鼓励警官们去统治和对峙……那些以敌意和憎恨的目光去审视市民的警官们不胜枚举,以粗鲁和不恭的态度对待民众的警官们太多了……至少有数百名警官多次滥施暴力,而警察局不仅没有解决这类问题,反而对这些警察进行表彰和提职^[39]”。

如果说警察因其所作所为而成为众矢之的,那么,法庭的判决则屡屡点燃暴力冲突的导火线。1980和1989年迈阿密暴力冲突前,黑人民众并没有因警察施暴而即刻发起暴力冲突,而是期盼法庭能公正地维护公民权利,当肇事警察无罪释放后,怒不可遏的黑人遂以暴力报复。在1992年洛杉矶暴力冲突前,法庭有三次激怒黑人的判决。一是一名黑人邮递员出于自卫而打死一位白人的狗后被判刑三年;二是韩国裔朴泰三开枪打死有抢劫嫌疑的黑人李·米切尔后,被无罪释放;三是韩国裔女店主杜顺甲开枪打死被怀疑偷窃橘子汁的黑人少女拉达莎·哈林斯,结果被罚款500美元并为社区义务服务400小时。黑人认为,黑人的生命不如白人的狗重要。如果被两名韩国裔枪杀的是白人,必然会被判终身监禁。在罗得尼·金一案审理中,黑人再次耐心等待法庭的判决,但结果再次让他们失望。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下,黑人相信惟有暴力才是迫使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听黑人声音的最佳方式。

四、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

民族多样性是美国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各民族在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同时,其交流和融合为美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之源。然而,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彼此间的竞争与碰撞也导致了种族暴力冲突。在20世纪,美国城市种族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其主要根源在于历史上种族隔离制度下对黑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但是,从50年代起,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强烈并在60年代后期走向极端化,导致黑人暴力的泛滥。在民权运动时期,虽然非暴力抗议深入人心,并得到了广大白人的同情和支持,但在这种主流的背后却隐藏着好战性色彩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倾向。早在1959年黑人穆斯林领袖罗伯特·威廉斯明确表态:“我们不能容忍那些在法庭上对我们不公正的人。我们必须惩罚他们。如果有必要用私刑去遏止私刑,那么我们愿意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唯一的、符合逻辑性而且能够成功的答案是,用大规模的有组织暴力回击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黑人自由战士必须使用的武器是贫民自制的军火……燃烧瓶、碱液和硫酸炸弹都可以广泛使用……少数民族的自卫战必将获得胜利^[40]”。这种以极端的暴力形式展示“黑人力量”的主张日渐成为指导黑人运动的主导思想,期望黑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能实现革命性的变化,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完全支配自己的命运。这种思维与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中的核心实质是一致的。妇女参加冲突是因为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要求废除对妇女在就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面有损于妇女尊严和私生活的规定,保护妇女控制生育的权利。其中的激进者不仅提倡同性恋或男女群居,而且还主张以暴力确立妇女的平等地位。同样,青年参与暴力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向来以自由和民主自诩的美国到处充满令人失望的矛盾现象:贫富严重分化,种族等级分明,男尊女卑盛行,在国际上高唱民主却入侵越南。所有这些都暴露了美国社会自欺欺人丑陋面目。这种心理以及对就业和对教育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使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了骚乱的行列^[41]。

1970年以后,随着中心城市种族构成的变化,美国的民族矛盾出现了新的特征。虽然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如故,但有色种族之间的矛盾空前加剧,每次暴力冲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主要是黑人,打击和排斥的主要对象是其他少数民族及其财产。1990年以前,在克利夫兰、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费城和迈阿密等城市,黑人先后与巴勒斯坦人、韩国裔、华人、老挝人和西班牙裔多次发生冲突。穷原竟委,这种现象滥觞于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黑人特别是其青年中不时发作,违法行为不断。1965年以来历次大型暴力冲突前的导火线固然与警察对黑人施暴有关,但受害黑人屡屡违法在先的事实表明了其“社会负我,你奈我何”的玩世不恭行为。大凡去过美国的人恐怕对黑人在大街上行为不拘、惹是生非的现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二是多数亚洲裔和拉美裔是在1965年美国移民政策改革后入境的,这一过程又是在美国向郊区化社会转变中发生的。他们聚居于中心城市后与黑人同处社会的底层,围绕日益枯竭的就业机会等经济资源的竞争比较激烈。由于许多亚洲裔和西班牙裔利用其技术优势,在经济阶梯上的“爬格”速度较快,黑人的不平衡心理油然而生。作为有色种族中的第一大群体,他们利用自己先入为主的优势和足以震撼美国社会的政治力量,动辄排斥后来的移民,其性质与19世纪美国土生公民排斥外来移民、西北欧移民排斥亚洲和东南欧移民及20世纪城市下层白人排斥黑人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认为新来者威胁到了自己的就业和生活水平。

在当代美国,迈阿密和洛杉矶作为亚洲和拉美裔移民进入美国的两大主要口岸,民族冲突比较频繁。然而,这两个城市的民族构成及其矛盾各有差异。在迈阿密,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中上层的古巴白人纷纷逃往迈阿密,其人数达到80多万。由于他们经济条件好,通晓英语,容易融入美国主流社会,1970年后有不少人进入市政决策圈。到80年代,不仅迈阿密的市长出生于古巴,而且市政委员会也是古巴裔的天下。

在该市选入国会的议员,有1/3是古巴裔。这种政治上的优势使迈阿密市能够长期实施有利于古巴裔和土生白人的政策,使黑人在同下层古巴裔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从70年代后期开始,黑人与西班牙裔的冲突不断发生。甚至在1989年迈阿密暴力冲突后,黑人再次发起了长达两年的抵制西班牙裔商品运动。尽管迈阿密商界大亨们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但始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位黑人领导人事后明确地说:“在21世纪,迈阿密要么成为一座民族大团结的城市,要么成为未来善与恶大决战的战场”^[42]。

相比之下,洛杉矶的矛盾更加复杂。在暴力冲突的中南区,其居民中44%为黑人,45%为拉美裔,亚洲裔占1%(主要是韩国裔和一些华人),白人为10%。但在该区的韩国城内,黑人为5%,西班牙裔为68%,韩国裔为26%,白人为25%。黑人主要居住在西南区,西班牙裔在东北区,位于两者之间的是韩国裔和盎格鲁白人^[43]。三个民族社区犬牙交错,彼此相连,既互相竞争,又互为依存。在经济资源和条件有限的空间,文化上的差异和日趋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四个种族之间形成一种难以愈合的矛盾关系。在黑人与白人居民之间,历史上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使两者积怨已久的矛盾无法愈合,在此无须赘述。就黑人与拉美裔而言,由于两者中的贫困人口比较多,文化水平低,经济活动主要限于中南区狭小的地域范围。在洛杉矶经济发展的时期,两者矛盾冲突比较少,但在80年代以来,随着洛杉矶低薪就业机会的减少,迁入的西班牙裔日渐增多,矛盾随之加剧。在1980年,洛杉矶中心商业区的清洁工几乎全是黑人,到1990年则完全被西班牙裔所取代。更让黑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服装、饮食、家具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前为黑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合同均被推翻,体面的工资也不复存在”^[44],所以,许多黑人经常“有计划地对西班牙裔特别是其中新入境的移民肆意进行攻击”^[45]。面对黑人的排斥,西班牙裔的敌对情绪随之加剧,并且利用1992年洛杉矶暴力冲突的机会对黑人进行报复。就韩国裔与拉美裔而言,自60年代以来,韩国裔以本民族合资滚动发展的模式使自己成为洛杉矶中南区服装、食品、饮食、加油站和住房租赁等行业的主要经营者,其中除了一些韩国裔店主自己统揽经营与管理外,还有不少韩国裔雇佣了西班牙裔。西班牙裔认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消费使韩国裔的商业得以生存和发展,而韩国裔既没有给予相应的回报和奖励,也没有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推进西班牙裔社区的环境建设或福利事业,导致西班牙裔资本外流,社区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尽管洛杉矶半官方的“人类关系委员会”曾用对话等各种方式进行协调,但“任何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46]。就黑人与韩国裔而言,由于黑人不了解韩国裔自筹资本和滚动发展经营方式,误以为韩国裔通过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方式与黑人竞争。他们在黑人社区只

顾赚钱,而不愿意雇佣黑人就业,更无意回报于黑人消费者及其社区。另一方面,韩国裔迁居美国时不仅带来了自身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经营方式,而且还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通过新闻媒体对黑人所形成的民族偏见,认为黑人懒散、不愿意读书,喜好偷窃和施暴,所以,一些韩国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出类似于白人对黑人那样的种族歧视。更糟糕的是,每当两个民族发生摩擦时,各自都从本民族的文化理念去审视对方,结果使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尽管双方领导人多次协调,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到1990年,两个民族的关系,就像洛杉矶市一位黑人领袖所说的那样,“已经到了足以引起爆炸性事件的程度”^[47]。在这种形势下,1991年3-5月间,相继发生了两名韩国裔枪杀两名黑人的事件。由于法庭判决结果与黑人要求惩罚凶手的愿望背道而驰,结果导致黑人与韩国裔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暴力冲突一触即发的程度。正是上述四个民族之间的错综复杂矛盾关系导致了1992年洛杉矶种族暴力冲突中因黑人反对白人而起、西班牙裔参与人数最多、韩国裔遭受损失惨重的罕见现象。

五、新闻媒体的肆意炒作

二战以来,新闻媒体借助科技事业的发展,作用凸显,成为美国社会信息传递最为快捷、覆盖面最广的载体,对城市社会和居民生活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果说战后交通工具的现代化拉近了各国和各地区间的空间距离,那么,新闻媒体的现代化则彻底打破了因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山关水阻的封闭状况,使人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天下大事。从正面讲,由于新闻媒体的快捷效用使人们能够及时地根据形势变化作出最快的反应,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对抑恶扬善、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反面讲,任何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如果没有经过认真的筛选就随意播报则会产生煽动民情、火上加油的作用。可悲的是,自60年代以来,美国的新闻媒体为牟取利润,在许多敏感问题上常常对报道材料肆意取舍、夸张甚至歪曲,夸大是非、添枝加叶或无中生有,一方面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并锁定了社会文化中的种族偏见思维定式,另一方面往往在事态悬而未决、民情日益升温的情况下,桴鼓相应,教猱升木,对事态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

美国民事动乱顾问委员会对60年代城市主要暴力冲突的调查表明:“我们城市实际发生的骚乱与报纸、电台和电视的报道偏差较大。”许多报道中,错误最多的是误导、夸张、重叠报道,最突出的是对没有根据而且可能引起新麻烦的谣言进行盲目推测。“各家新闻媒体不仅对于事件爆发的各种促成因素没有充分报道和分析,没有矫正黑人在民权运动后期社会期望值的过高及其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且也没有与民众

沟通美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实质及应该采取的解决办法,没有对隔都区黑人的困境和苦难情绪进行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全国民众的态度以及他们参与暴力冲突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许多读者从报纸上阅读了外地骚乱报道后他们自己都参加了骚乱。”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底特律、辛辛那提、坦帕、西雅图、旧金山等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暴力冲突中都非常明显^[48]。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媒体追求商业暴利的运作模式依然没有改变。一方面,报刊杂志和影视公司为拉拢消费者,经常播报社会上的敏感性和刺激性事件,尤其是每天黄金时段,各家电视台或影院竞相播放充满凶杀情节的警匪片,其中的凶杀技巧和方式以及黑帮成员的一举一动都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和青年崇拜的偶像,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难怪美国学者乔尔·贝斯特等人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全国有数百万年轻人的言谈、衣着、行为、甚至感觉都像黑帮成员。黑帮生活不是从某一个隔都区学来的,我们的媒体已将其传至每一个角落。”虽然很难断定新闻媒体特别是以残酷无情的凶杀为题材的影视就是我们社会中黑帮暴力的由头,但谁也不能否认,美国各类黑帮的反社会暴力问题的丛生和永久不衰都与充斥各类影视屏幕上的多重凶杀、爆炸事件和消灭敌手的镜头以及国际上连续不断的无情战火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果对每次大型暴力冲突仔细地进行分析,这种联系便清晰可见^[49]。另一方面,在所有涉及城市问题的许多报道中,不仅缺乏公正而客观的报道,而且由于在编辑上仍然采取了歪曲事实或无中生有的手法,以致许多报道与实情背道而驰。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自70年代以来,“关于中心城市的负面和敏感性的报道之多不胜枚举。人们在电视中常常看到的是黑人如何参与暴力犯罪与毒品走私,而实际上,美国的绝大多数吸毒者是白人。绝大多数制毒者、贩毒者和兜售毒品者都不是黑人。然而,我们从新闻媒体上所看到的都是黑人男性^[50]”。这种歪曲性的宣传不仅会误导广大民众,而且会加剧各级政府决策者对城市及其贫困人口尤其是对黑人的鄙弃心理,进而对中心城市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产生消极的影响。

就洛杉矶暴力冲突而言,新闻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在黑人与韩国裔的民族矛盾中,新闻媒体小题大做、挑拨离间,加剧了矛盾的升级。早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洛杉矶和芝加哥市的韩国裔小店铺和餐馆迅速增加,洛杉矶的一家报纸扬言:“过去五年来亚洲裔占领了黑人社区。”而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则声称:“韩国裔计划在控制南芝加哥第47街区。”纽约的报纸则攻击韩国裔在“剥削黑人社区^[51]”,各地报刊这种频繁的报道和宣传不仅使黑人与韩国裔的矛盾由一个地方问题演化为全国性问题,导致了美国各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地

抵制韩国裔商品运动,甚至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几次同时出现黑人抵制韩国裔商品的运动。在1990年,纽约一位海地黑人移民指责一位韩国裔有无理侵袭行为后,引起全国媒体的反复报道,促使纽约市黑人发起了长达17个月的抵制韩国裔商品运动。在黑人少女哈林斯被杀后,各地电视台将其录像带与罗得尼·金被打的录像带同时反复播放,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这样,将韩国裔与施暴的白人警察一起推上了道义上的“被告席”。韩国裔由此相信,“在白人操纵的新闻媒体中可能存在着一种阴谋,即煽动一个少数民族去反对另一个少数民族,然后再坐山观虎斗^[52]”。这种看法并非耸人听闻,甚至闻名遐迩的影城好莱坞也有类似的现象。就在1992年洛杉矶种族暴力冲突爆发之前,好莱坞发行的《第二次威胁》、《速变》、《垮台》和《匡扶正义》等一些影视片中仍然是以黑人和韩国裔的矛盾冲突为题材的。其中的主角基本上都是黑人,而华人和韩国裔等则是被丑化的对象。其中有不少情节中都充满了“恶意的嘲笑”和“令人厌恶的幽默^[53]”。第二,在洛杉矶警察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各家电视台日复一日地反复播放警察殴打罗得尼·金的录像;同时,《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竞相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洛杉矶警察局知法犯法的文章。例如,在1991年3~9月间,《洛杉矶时报》围绕罗得尼·金被打事件,先后发表了357篇文章,而当地的黑人报纸《洛杉矶哨兵》也发表了137篇文章。前者创刊于1881年,1991年发行量117.7万份,后者创刊于1933年,是洛杉矶市黑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54]。《洛杉矶哨兵》作为当地黑人的喉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带有挑战性的态度,呼吁黑人社区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决不能坐视这场斗争。必须还以司法公正。我们必须至少是其中的主要执行者。”虽然《洛杉矶时报》开始对罗得尼被打事件的报道比较平淡温和,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字里行间的火药味浓厚有加。1991年3月12日的社论中写道:“洛杉矶人民一直无法使他们的警察局长达利·盖茨对任何事情负责,其中包括他的种族观念和成见、他对公众、陪审团、以及他所宣誓愿意捍卫的宪法所表现出的公然蔑视、他对政敌的监控及与之相关的秘密活动。”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洛杉矶时报》又将矛头对准警察局长盖茨,认为“警察局长盖茨对于他自己具有煽动性的言辞、对于他麾下的警官们的行为以及1990年因民怨投诉日益增加而迫使警察局从人民交纳的税金中拿出800万美元来做赔偿的事实都负有责任。然而,由于僵化的文官制度的保护,警察局长现在不对市长负责、不对市政会议负责,不对选民负责^[55]”。类似如此犀利的批判文章在当时各家报刊杂志中俯拾即是,其后果必然会进一步丑化警察局长的形象,刺激民众的憎恨情绪。第三,在洛杉矶种族暴力事件爆发后,新闻媒体的现场报道加剧了暴力冲突的升级。在暴力冲突初期,尽管有数十名警察在竭尽全

力维持秩序,但是,“在电视屏幕上却成了只有愤怒的暴民而根本没有任何警察控制的画面。暴民的形象进一步削弱了遏止骚乱的力量,加剧了歇斯底里的情绪。附近的居民和全国各地的观众目睹了骚乱的爆发、升级和破坏后,有许多人在激动之下参加了骚乱”^[56],洛杉矶是如此,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和亚特兰大暴力冲突中也是如此,其中的许多参与者都是看到洛杉矶暴力冲突中的无政府状态的镜头后加入了抢劫、纵火和杀戮的行列。这些事例都充分表明,在1992年洛杉矶种族暴力冲突中,新闻媒体的煽动性语言、小题大做的技巧和臆断性推测等都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用感情和狂热取代了理智和冷静,并且在贫困、愤怒、受挫和失望的情绪中以暴力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由此迸发的爆炸力和破坏性就决非某一个人或一个政府部门所能左右了。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种族暴力冲突滥觞于人口流动和城市结构变化后所出现的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困、种族歧视和不公正的司法、日益复杂的民族矛盾以及新闻媒体的炒作等等。各种因素犬牙交错,互相影响,导致城市种族暴力冲突的频繁发生。每次暴力冲突后,虽然政府都会进行调查并许诺解决中心城市的各类问题,但是,由于没有打破传统的政策和社会服务机制,也没有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下既定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因此,无论政府实施什么样的政策,都始终不能走出业已形成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怪圈。如果各级政府对贫富两极化、种族歧视和警察司法等问题冷眼相待,任其继续恶化,那么,种族暴力冲突不会随着20世纪

[参考文献]

- [1] 杨生茂 刘绪贻. 战后美国史 1945~1986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300-302.
- [2] Hughs D. Graham and Ted R. Gurr,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vol. 1p. 41. Daryl B. Harris, The Logic of Black Rebellions.
- [3] Jackson and Schultz. p. 486.
- [4] Hughs D. Graham and Ted R. Gurr,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vol. 2. p. 309.
- [5] Peter H. Rossi, et al., The Roots of Urban Discontent: Public Policy, Municipal Institutions and Ghetto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74) p. 3. California Governor's Commission on the Los Angeles Riots, Violence in the City: An End or Beginning, ed, Spence Scrump, Black Riot in Los Angeles, The Story of the Watts Tragedy (Los Angeles, Trans-Anglo Books Inc., 1966) p. 127 David Osears and John B Mc Conahay,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The New Urban Blacks and the Watts Riots (Boston, Hugh Mifflin Company, 1973), p. 3. Paul A. Gile, Rioting In America (Bl - oomington, Indiana Unive - rsity Press, 1996) p. 158. Der - ald Hbm, Fire This Time, The Watts U - prising and the 1960s(Charlo - 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5) pp. 98 - 99.
- [6] Heaps pp. 153 - 154, 158.
- [7] Armando Mbrales, Ando Sangrando (I and Bleeding): A Study of Mexic and American - Police Conflict (La Puente, California, Perspec - ive Publi - ca - tions Inc, 1972,) p. 100.
- [8] Dennis E Gile, Understanding Urban Unrest: From Revered King to Rodney King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6) p. 104 - 106.
- [9] The Institute of Alternative Journalism, Inside the L. A. Riots: What Really Happened and Why It Happened Again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Journalism, 1992), p. 68. B. Drummond Ayers Jr., From Coast to Coast, Cities are Struggling th Control a Swell of Violence, New York Times, May 2, 1992 p. 10L. Gale p. 6.
- [10] Mark Baldassare, The Los Angeles Riots, Lessons for the Urban Futur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94), p. 141. Gale, p. 7. Los Angeles Times, Understanding the Riots: Los Ange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odney King Case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Tiems, 1992) p. 130. California Legislature, Senate Task Force on a New Los Angeles, New Initiatives for a New Los Angeles: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Sacramento, California Senate Publications, 1992) pp. 10 - 12. Calif - ornia Legislature, Assembly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Los Angeles Crisis: To Rebuild is not Enough: Final Report and Recom - mendations, September 28, 1992 p. 1.
- [11] Baldassare p. 141. Parl Lieberman and Richard Oreilly, Most Looters Endured Lives of Crime, Poverty Los Angeles Times, May 2, 1993 p. 1A.
- [12][24][45] Baldassare p. 153 p. 36 p. 159.
- [13] U. 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The Kerner Repor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 pp. 130 - 133. Bruce Porter and Marvin Dunn, The Miami Riot of 1980, Crossing the Boun - d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4), p. 114.
- [14] Porter and Dunn, pp. 114 - 115.
- [15] U. 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p. 136.
- [16][17][18] U. 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Rediscovering Urban America, Perspectives on the 1980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p. 218, 278 - 279; p. 164; pp. 270 - 279.

- [19] 梁茂信.当代美国人口流动及其区域性影响[J].世界历史. 1998 (6),16- 23.
- [20] U. S Congress , Senate ,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 - king ,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 The State of Urban America , 103rd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 pp108 - 109 (以下简称:Hearings ,SI03 - 167,1993);Arlene Zarembka , The Urban Housing Crisis : Social , Economic and Legal Issues(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 1990) pp.2 - 3.
- [21] Rebecca Mbrals and Frank Bonilla , Latinos in a Changing U. S. Economy: Comparatives on Gowing Inequality (Newbury Park , California ,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3) .p. 59.
- [22] Roger Waldinger and Mehdi Bozorgmehr , ed , Ethnic Los Angeles (New York , Russel Sage Foundation ,1996) .p. 7; John C. Boger and Judith W. Wegner , Race ,Ethnicity and American Cities(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 171.
- [23] Richard W. Stevenson , The Sputtering California Miracle ,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7 , 1991 , p. 17LD.
- [25] James B. Steinberg et al. , Urban America , Policy Choices for Los Angeles and the Nation (Los Angeles , Rand Company ,1992) ,pp. 9 - 10. California Legislature , Senate Special Task Force on A New Los Angeles , pp. 8 - 9.
- [26] U. 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 pp. 1 ,203.
- [27] Thomas B. Edsall and Mary D. Edsall , When the Official Subject is Presidential Politics , Taxes , Welfare , Crime , Rights or Values , the Real Subject is Race , The Atlantic , vol. 267 , no. 5 ,1991 , p. 53.
- [28] Peter M. Muller , Contemporary Suburban America(Englewood Cliffs , New Jersey , Prentice Hall Inc ,1981) ,pp. 91 ,104 , John M. Gering , Housing Desegregation and Federal Policy(Chapel Hill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p. 9
- [29] June M. Thomas , Redevelopment and Race : Planning a Finer City in Postwar Detroit (Baltimore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p. 204 - 205.
- [30] Eui - young Yu , Black - Korean Encounter : Tward Understanding an - d Alliance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1.
- [31] U. 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p. 299.
- [32] Nathan Wright Jr. , Ready to Riot (New York , Holt , Rh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p. 138.
- [33] U. 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p. 206.
- [34] Barbara H. Chasin , Inequality and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 Casualties of Capitalism (New Jersey , Humanities Press ,1997) , pp. 96 - 97.
- [35] Gale .p. 108.
- [36] Dean E. Murphy , Complaint Against L. A. Police Abuse , Los Angeles Times , October 17 ,1991 .p. B - 1.
- [37] Lynell George , No Crystal Stair : African - American in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New York , Verso Company ,1992) .p. 97.
- [38][53] Horne .p. 359 .p. 356.
- [39] Joe Domanick , To Protect and To Serve , The LAPD 's Century War in the City of Dreams (New York , Pocket Books ,Inc. ,1994) .p. 401.
- [40] Graham and Gurr , vol. 2. p. 307. Bossel and Rossi .p. 297.
- [41] U. 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p. 232. Graham and Curr ,vol. 2 .p. 326.
- [42] 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J].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6 ,331,417.
- [43] California Legislature , Senate Special Task Force on a New Los Angeles .p. 7.
- [44] Robert Suro , Strangers Among Us , How Latino Immigration is Transforming America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Inc. ,1998) .pp. 212 - 213.
- [46] Boger and Wegner .p. 171.
- [47] Marl Lacey , Racial Tension Over Korean Merchants , Los Angeles Times , May 13 ,1990 .p. 1A.
- [48] U. 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 pp. 363. 366. 372.
- [49] Joel Best , Random Violence : How We Talk About New Crimes and New Victim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77. Lweis Yablonsky , Fifty Years of Madness , Drugs and Death on the Streets of America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6 - 27.
- [50] The Hearings ,103 - 167 ,1993 .p. 78 - 79.
- [51] Eui - Young Yu , pp. xiv - xv.
- [52] Kyeoung Park , Use and Abuse of Race and Culture , Black - Korean Tension in America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vol. 98 , no. 3 ,1996 , p. 496.
- [54][55] Ronald N. Jacobs , Civil Society and Crisis , Discourse and the Rodney King Beating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101 ,no. 5 ,1996 .p. 1243 .p. 1247 - 1248 ,1251.
- [56] Brenda Wall , The Rodney King Rebellion :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Racial Despair and Hope (Chicago , African American Images , 1992) , p. 32.